

打通学科藩篱， 传承与创新是永恒的课题

——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

李俊杰 智慧 董晨曦

Q 藩镇是唐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您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一书自1987年面世、2010年增订，如今又在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三版，初版5000册，只有两三个月就重印了。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您写作这本书的心路历程吗？

张国刚 研究藩镇其实最早是我的导师杨志玖先生提示我的，说藩镇是一个非常值得做的课题，我就仔细读书，读史料。我当时做了很多读书卡片，现在也还保存着。通过这些卡片写了很多微观视野的文章，包括监军、进奏院等等的研究。但我当时更感兴趣的是宏观的问题：藩镇到底是什么？藩镇和中央到底是什么关系？唐代藩镇不都是割据的，“藩镇割据”这个概念本身存在问题，这是一个很朴素的认识，有了这个初始印象之后还必须找材料做精细的论证。在细读《资治通鉴》的基础上，我找到了李吉甫、杜牧等人对藩镇的论述作为展开讨论的线索，从这些论述出发就能很快地厘清藩镇的功能性类别，而功能性类别和地域区划又能够

吻合，所以就能够构建一个宏观的藩镇格局。当然中外学者的论著也给我以启发，比如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大泽正昭等先生对藩镇的研究。

我当时整天苦苦思索，不断思考、试写，找突破点。我常常和我的研究生讲，不能只坐在桌子前才开始思考问题，要从早到晚去想去思考，史料怎么更加细致地解读、问题怎么表述、学术语言怎么组织，念兹在兹，你才能有新见。也可能“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许大家谈论的只是别的问题，可是只要你心中有问题意识，任何一个有启发的信息都有可能让你突然产生新的想法。

我的第一版修订（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后来发表的文章。《唐代藩镇研究》这本书是专题性质的书，属于论文集性质，结构体系上不追求面面俱到。现在修订版还未出版，准备增加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发展过程的分析，把安史之乱后到唐亡期间的政治风潮、藩镇的格局变化等等做了一个梳理。



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等荣誉。多部著作被译成外文和繁体字在海外出版。

Q 《唐代藩镇研究》问世至今已近40年，请问您认为这几十年间学界在藩镇研究方面的研究思路和基本结论上是否有重大突破？当代青年学人如果想在藩镇研究上取得新突破，您有什么建议？

张国刚 就藩镇的整体格局而言，应该说基本是在我的论述框架下继续推进。但是我的研究也只是

提供一个框架，框架之下还有深入和细致挖掘的空间。比如可以做一些精细的个案研究，对某个藩镇或者某类型的藩镇进行讨论。藩镇研究除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意识，还需要找新的面向。这就要进一步深入到史料的细部、问题的细节，做条分缕析的归纳整理，这样做总能有新成就。至今四十来年的研究论著，主要也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比如我有一个博士生做藩镇的“押衙”研究，认为“押衙”已经不止是一个官职，而是变成了一种身份。地方上武职、虚职的泛滥，可能与“员外”变成宋代地方绅士普遍使用的雅号有关系。

我认为历史研究、人文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不一样，自然科学研究更强调日新月异的创新，自然科学留下的经典主要是历史资料价值。人文社会科学渴求新材料、新视角，因而推动创新，但新材料、新视角不是常有的东西，经典研究对人文学科来说更多的是传承。今天我们在历史学科、人文学科里也都在讲创新，但很多时候把人文研究变成了写文章的技巧，这方面我有点谨慎地说是误入歧途。我们培养人文学科接班人的时候，主要是关注他有没有学术训练、能不能读懂文献、能不能理解文献，然后做出新的分析。现在大家为了把文

章做出来都找很偏僻的东西，而不是把文明的传承作为人才培养的重点。博士生现在大学不硬性要求发表多少文章，可是用人单位却看发表决定是否录取，使得学生培养被分了心。大约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Q 近年来五代十国的研究变热，请问您如何看待五代的历史地位？您认为研究十国史对于我们思考藩镇问题和结束分裂的“历史出口”是否有所帮助？

张国刚 “历史出口”这个词不好把握，但是五代十国史很值得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有纵深（向前唐末，向后宋初）；纷争凌乱的事件可以激发丰富的问题意识；有史料，过去研究留下的空白还很多。这个问题引起我很多的联想和思考。中国的历史有两个重要的线索：一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和价值的塑造和形成过程，从夏商周三代、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来一直不断地融合、深化发展；另一个线索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最早的挑战是五胡十六国，隋唐王室起自六镇，有胡的传统，品格和汉代不太一样，隋唐阶段性地解决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唐太宗讲“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显示出两个问题，



《唐代藩镇研究》书影

一个是内部的藩镇割据，一个是东北地区的胡族政权。这在五代十国时期更加严重，宋代更甚，面临辽、西夏、金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直到元朝建立大一统国家，这一“阵痛”的过程也是多民族国家深入发展的过程。宋朝解决了地方与中央分权的问题，但从安史之乱到赵宋建国的两百年间，东北方向的“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出现了比安史、河北藩镇更强大的胡族政权，元朝也是胡族政权，明朝把安史以来经过五代到辽夏金元胡汉融合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做了一个总结，消化了几百年的胡汉融合问题。

直到明朝时期，我们的版图都是有限的，也没有完全体现少数民族对疆域的关切。清朝才完成这个问题，版图比汉、唐、明有很大的拓展，包含了多民族对

疆域的诉求，更进一步融合了胡汉，这个遗产到了中华民国就是“五族共和”。最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民族、文明大一统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五代或许可以作为两个发展过程当中重要的转圜时期。

Q 您最早是从制度史开始您的研究之路，并著有《唐代官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等。您认为制度史在唐史研究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您认为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制度史的训练是否是一个比较好的入门途径？

张国立 制度史作为邓广铭先生所讲的“四把钥匙”之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有基础性意义。我在课堂上经常说，如果不懂制度，就没法真正地理解历史故事背后的逻辑。比如魏征当初批判唐太宗，唐太宗让将作监修葺宫殿，宰相房玄龄向将作监询问详情，唐太宗很生气，认为宰相不该管这么多。房玄龄向太宗道歉。但是魏征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责怪房玄龄，也不明白房玄龄为什么要道歉。因为根据典籍规定宰相必须知道这个事情，修葺宫殿（包括公共事务）如果超过一千工（1000人工作一天，或100人工作10天）必须先报告、做预算，这是有制度规定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制度，你就不明白宰相制

度、中书门下的运作。所以制度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基础，是一把“钥匙”。

制度研究相对比较实证，对于青年学人初入门打基础来说，是比较好的训练。因为制度比较实在，容易抓得着。一般的课题，问题意识不容易产生，或者有点空虚、不知道材料在哪儿，这两个风险都很大。制度史是有材料的，而且做实证的研究能够训练我们从扎实的问题入手，不是从虚空的问题入手，有好处。所以我很赞成硕士论文做制度史。但做这种研究要求读书多的同时，还需要读书细，因为制度史的研究相对比较死，可能别人已经做过了。而且制度史的材料比较集中，比如两唐书的《职官志》和《百官志》《六典》《通典》，如果只是浮于表面就不行，既要熟悉典章制度，也要能够超越志书的记载，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比较扎实。

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很留意职官制度，比如在读《全唐文》《墓志汇编》的时候，凡是涉及制度的内容，不管多么细微，我都用小卡片记录下来，最后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比如陈国灿、刘健明编《〈全唐文〉职官丛考》的书评（《唐研究》第五卷）。上世纪90年代，我已经转向去做社会史了，你都不能想象那些小

官制我是怎么从材料里找出来的，连检索都不知道词是什么，我能指出《〈全唐文〉职官丛考》的一些缺漏的地方，是因为我对于制度史的词汇高度敏感，碰到就记下。所以做制度史研究要勤翻书，既要细读还要广读，你才能超越那些志书的记载。要不人家根据志书记载把大面上的内容写出来了，你还搞什么？制度史课题内容广阔，大的有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小的有科举制度、兵役制度、僧官制度。青年学人可以从一个具体、实在的制度问题入手，来练基本功。

我后来做社会史，写了好多篇中古家庭史的文章，所以我的集子叫《大唐气象：制度、家庭与社会》。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不久，南开大学有个“211工程”项目叫“中国社会历史”，要把中国史整合起来，以社会史为基础比较好整合，但是狭义的社会史又太窄了一点，就叫“中国社会历史”。所以南开有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当时刘泽华老师做“思想与社会”，冯尔康老师就搞宗族制度，朱凤瀚老师做商周家族制度。我做中古就做家庭史，比如儿童问题、妇女问题、老人问题（包括养老问题）、婚姻问题、生计问题。做家庭史的时候，除了通常的史书，我重点看两类文献，一个是出土石刻墓志，一个是《太平广记》

等笔记小说。其成果，就是我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家庭史》，其中，我写第二卷。

Q 您如何看待当前唐史研究的现状？您认为唐史研究还有哪些仍然有待挖掘的学术增长点？

张国刚 传承与创新，不可偏废。我认为，人文学科包括唐史研究的创新是人才培养，即人才培养过程中，通过论文写作的训练，让新锐青年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能够写出自己的心得。破“五维”要在这方面去认识。因此，只要仔细研读史料，善于提炼问题，就是“学术增长点”。“生地”（鲜有耕耘的题目）容易增产，“熟地”（学术积累丰厚的题目）就需要大家切换视角。

总起来说，人文学包括历史学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史料的填补空白，比如当前大家都喜欢用墓志、敦煌吐鲁番文书、《天圣令》等等新材料做新研究，这自然能获得创新。这不仅是学科本身的需求，也是学者能够更快发表新成果的法门。

二是新的视角、新的问题意识。为什么会有新的视角，这跟时代有关系，有些问题是时代提出来的，全球史、医疗史、环境史的兴起就是新视角、新问题意识带来的新的研究热点。过去都



《中国家庭史》书影

是政治、经济、军事、人物，现在往下沉。或者是由生活提出来的新面向，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我早年的学生、现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利华教授做中古饮食文化的研究，就是从传统文献中找出了新问题。此外，历史包括“史”和“论”，社会科学（比如艺术史）更偏重“论”，“史”比较弱。我们专门讲“史”，那我们的“论”在哪呢？我们从历史本身来讨论，所以我们和法制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学科有交叉地带，并成为新的增长点。有些时髦的学科，他们的学者不往历史这个部分去用力，一个原因是社会科学更关注现实；第二个原因是历史学（尤其是古代史）还是有些门槛的，这就给我们历史学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历史学的同学往这个地方去，比如我现在有个博士生做经济史，刚才提到的

王利华做环境史，我还有学生毕业后到法学系当教授。这也是历史学科的一个方向。同时，你到其他专业去教书、去搞研究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自然有一个理论框架的牵引。

三是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历史现象的不同面向，从而形成新收获。即使是传统的文献史料，深耕细作，还是有很大空间的。过去做的东西有些很粗疏，比如我们以前研究农民战争挖掘了很多资料，现在我们从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的角度看当年的史料，这里面就有很多深耕细作的空间。政治史也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的政治史有些脸谱化。但政治史不仅要有史料、有新锐的思想，还要有好的文笔把权力运行的细微处写得出神入化。

还有做“翻案”文章、做“商榷”文章的，也是一个路子。比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提出商榷，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他并不能完全否定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只是丰富了人们的认识，道理讲得更周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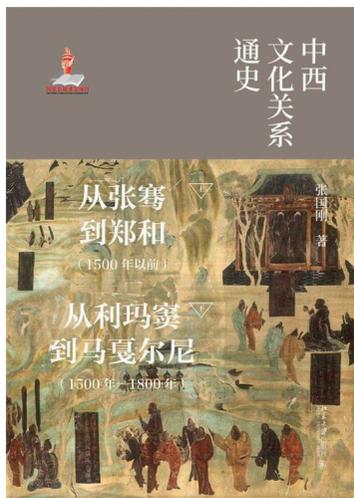
Q 您除了在唐史领域卓有建树，也广泛涉猎西方汉学、中西交通史，著有《中西文明的碰撞》《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

文化交流》等。请问您是如何完成这样的跨领域转换的？中西交通史在中国史学界开始较早，您认为您的研究与早期研究有什么异同？您如何理解中西文明的差异？

张国刚 治学经历离不开学者个人的生活经历。1989-1999年期间，我在欧洲生活和工作了许多年（最长一次连续五年），因此有机会了解西学。过去大学历史学系有一门叫做“中西交通史”的课程，重点是关于西域南海的史地考证。而在外国语言文学领域，则有“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科，重点是传教士入华以来即明清以来的文化交流史。钱钟书在英国的学位论文研究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小说中的中国，就属于这一类。

1989年我去德国的时候33岁，还比较年轻，学习新东西也不是很困难。我曾教一门课“中外关系史”。那时候介绍西方汉学很时髦，但还没有介绍德国汉学的专书，所以我应中华书局的邀请给他们介绍德国汉学，搜罗了很多材料，每月一篇写成文章，最后汇聚成书。回国之后也开了一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课程，带了研究生，申请了研究课题。

中西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史料搜集也比较复杂。从细节上写文章，是一个路子；从总体上梳理，是另外一个路子。我打个比方，冯友兰先生编写了各种不



《中西文化关系通史》书影

同篇幅的《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生编纂了《国史大纲》，都很有贡献。我不敢与先贤比，只是说，微观研究是一种学问，打通学科藩篱也是一种学问。我想把中西关系史打通来做，即把西域南海的交通史与明清时代的文化交流史打通。因为我做中西文化关系是从明清传教士入手的；加上之前做中古史，从张骞到郑和这段历史我很容易进入。所以我就有了《中西文化交流通史》这本书。全书两册，上册副标题是“从张骞到郑和”，下册副标题是“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如果我将来要再修订这本书的话，我会更清晰地加强对“西”这部分的叙述。

中国人对于“西”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德国教授罗梅君在她给我写的德文书评里，对于我们把“西域”（广义）都称为“西”觉得很有些好奇。其实我们的传统中，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记、

郑和下西洋，以及近代的“西方”，都是中国人与异域文明打交道的历史，只有打通才能看清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程。而西方人从来不会把“中东”“近东”当做“西”来认识。这就是立场位置不一样。

如何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一个太大的课题，我之前也写过文章。简单地说，在整个世界文明大花园里面，中国文明是独树一帜的。印度的语言跟欧洲的语言是印欧语系的；印度上层的人种和西欧的人种是一个人种；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在思维惯性、思维结构上是相通的。中国跟这些文明之间有地理上和空间上的断层，就靠“一带一路”连起来。印欧人也不是没到东方，三星堆和安阳就有西亚文明的痕迹。但是整体来说，中国是在独立的空环境里发展的。这种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线索：第一个是中华主体文明的产生、传承、发展，还有一个就是与周边“夷狄”民族的交融，即胡汉关系问题。两个线索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特征和发展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也是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中华五千年历史规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只能这么做，只能是“中国式”的；现实国情也要求我们只能这么做，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现状出发。从实践上来说，讲中国式现代化，

已经不再是停留在中西文化有什么差别这个泛泛的问题上，而是要求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明的历史延长线上构建自己的现代化。而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中西文明的比较应该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当中来讨论。比如说我们做历史学，肯定离不开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现象的观察和认识，要梳理和归纳，上升到一些符合中国历史、能够解释中国历史的概念、范式和系统。一百多年前，清华先贤们借“西学”来释“国史”。今天我们讲中国社会科学的再出发，就要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传统当中构建我们的概念、范式、系统和理论。这本身就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思想、文化和学术建设的一部分。

在中国学术回归中国历史本身、而不是用西方理论图解中国历史的过程当中，参悟西方文化这个“他者”，它只是“它山之石”而已。比如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制应该怎样认识？是站在西方立场上否定，还是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加以评论和总结？中国的礼教传统与西方的宗教传统，究竟如何评价？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路径。中国至少从秦汉时代起就是依赖国家税收来维护国家与社会的运转，而西方由于其

封建制度，除了军费，国家财政主要来自王室财政，于是后来有一个近代向“财政国家”过渡的说法，可是这些概念与中国历史风马牛不相及。总之，如果现代化是人类共同诉求，那么中国文明也一定会生长出自己的现代化。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应该深入研究，责任重大。

Q 您如何评价西方汉学呢？您怎么看待西方汉学家跟中国学者之间的差异？

张国刚 20世纪90年代介绍域外汉学比较热，客观上也有我在德国大学工作的这个便利条件。从那里我才切入了中西文化交流这个领域。西方汉学有自己的视角，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认为西方汉学是可以作为历史现象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西方人从西方中心论出发，对非西方文明都带有一种好奇的色彩，最典型就是东方学。早期东方学一直是包括近东的学问，包括印度、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因为这些文明和它的关系很密切。那么到了大航海时代，随着后来的考察，他们又到了远东，远东中国文明跟那些不一样，它是个活的文明。印度文明过去他们认为只是雅利安人的文明，但是大概在1921年考古发掘了哈拉本文化，才知道公元前2500到1500年前还有一个

土著的文化，当时社会影响很大。

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过去和东方学一样是死的学问，慕尼黑大学的SINOLOGY专业是不提倡学现代汉语的。但是中国这个国家是活的，跟传统的东方学不一样。印度二战结束还没独立，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结连绵不断。因此汉学在西方的东方学里面总是有点不一样。东亚学包括中日韩，汉学总是最受欢迎的。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建交、中国重返联合国，西方的中国学就分成两块了，一块叫中国学（China Studies），一个叫古汉学（Sinology），欧洲往往有汉学系，美国一般在历史系、文学系、哲学系等等。总之西方的所谓的汉学，早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文明研究，一种对非西方文化的古董式把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西方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就重视起来了。

我现在很少纯粹做汉学研究。我认为，汉学研究有两个品相；一个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另外则是应该把西方汉学家看作我们的同行，应该把汉学研究放在学术史里面去了。比如，李学勤先生研究清华简和先秦史，很多欧美同道都是作为同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早先，我们介绍汉学是



张国刚教授在课堂上

把它当做文化交流现象，了解他们是怎么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今天再这样研究西方汉学，几乎只有新闻学中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的意义了。

今天我们应该把西方汉学家当成别有学术背景的同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环境下，他们可能对某些问题别有洞见。今天的西方汉学其实就是不同的人研究共同的问题，把他们看成互相切磋的学术同行就好。

但是，我反对对于西方汉学那种“不明觉厉”的崇拜。尤其是翻译西方汉学著作的时候，要有所选择，完全出于商业目的大量翻译没有定评的西方汉学著作，

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说重一点，也是一种文化入侵。

Q 您著有《〈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资治通鉴〉通识》等书。请问您如何评价《资治通鉴》这部书的价值和地位？

张国刚 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这就是“预流”。有新材料就有新学问。但是，人文学的意

义不仅仅是为了学者“预流”而存在，也不仅仅是为了写出文章。传承经典是永恒的课题。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都是“文献”，各有特点，不可偏废。唐长孺先生、王永兴先生等学者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做出开创贡献，都是因为传统文献功底深厚。你们的问题涉及两点，一是如何认识《资治通鉴》这部书的价值；二是如何认识传世文献的价值。

我觉得《资治通鉴》的首要价值是它用编年体记载了1362年的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从战国到北宋建立前这段历史，可以说是难得的、罕见的、甚至唯一的通史著作。二十四史相关的正史不能代替《资治通鉴》，

因为它们很难是通的，还存在重复，是一个个的人物、一个个的制度，不是一贯到底写下来的。《资治通鉴》的编年史记载符合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习惯和阅读习惯。而且《资治通鉴》是像司马光这样有学养、有政治经历、酷爱史学的专门的班子花了将近20年时间编撰的著作，还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工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过。这部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一个个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对我们的意义，还在于它对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长河脉络讲得详尽清楚。

如果没有《资治通鉴》，我们要怎么认识这段历史？从正史里面一段段拼起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它不一定很周全，所以梁启超讲这是一部罕见的大书，至今没有超过它的。可是因为我们过去历史专业的培养习惯和训练习惯，大家都无视这本书，把史料价值作为评价一部史书的唯一标准，甚至是最高标准。一部史书是否提供独有的材料，这只是一种认识角度，而且是比较基础的角度，基础就不太高明。现在专业工作者很少把《资治通鉴》通读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我们在研究中国通史的时候，有《资治通鉴》就可以不用读其他分散的史书。我觉得从理解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史学和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这部书是不可或缺的。📖